



国防大学 2 071 0228 6

文史资料选辑

合订本

第 39 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耆年忆旧

我与中国福利会	耿丽淑(1)
回忆中国农学会	吴觉农(14)
抗战期间在重庆	金善宝(19)
葛敬中对发展蚕丝事业的贡献	毛振寰整理(27)
林同骅自传	(33)

人物述林

忆阿不杜克力木·阿巴索夫	李泰玉(41)
记冯玉祥和先父李根源的交往	李希泌(57)
林森在重庆	王抡桢(63)
张学良将军二三事	汤纪涛 汤纪森(68)
先父冯占海将军生平概况	冯树棠(83)
段绳武先生的理想和事业	屈卓吾 段恕诚 段至诚(94)
为国货事业奋斗终生的王性尧	寿墨卿(102)
自学成才的典范 ——马一浮事迹侧记	黄萍荪(115)

我所知道的张国焘 张之楚(138)

抗战史料

卢沟桥慰劳采访记 赵荣声(152)

抗日战争回忆录 张发奎(159)

调整第四战区的兵力部署——敌人钦州登陆——

对广州附近之敌采取机动攻势——桂南战役——

调整部署——战况沉寂时期——桂、柳会战——

百色整军——第二方面军——克复南宁——抗

战八年的感想

爪哇华侨集中营纪实 张又君(206)

质疑·补充·订正

对选辑 107 辑所刊蔡文治《回忆马歇尔将军在华调处

国共合作的经过》一文的商榷 余湛邦(218)

我与中国福利会

耿丽淑

作者是在华工作的美籍专家，早在1926年来到中国，曾在宋庆龄缔造的“保卫中国同盟”工作。50年代初期，接受宋庆龄副主席的邀请，冲破美国政府的阻挠来到上海定居，被聘为中国福利会顾问，迄今35年。本文如实地介绍旧中国的苦难，并由衷地表达了她对宋庆龄副主席的敬爱与感激之情。

1952年，我开始定居中国上海。事实上，我最早到中国来应追溯到1926年。我为什么要不远万里到中国来？而且又和中国革命连在一起呢？因为这牵涉到我童年的好奇及青年时代的理想。

我与中国

我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比兹堡，后又搬迁到美国中北部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我父亲是基督教卫理公会教堂的牧师，他见多识广，加上在教堂工作，接触面很广。那时，我们家里经常宾客盈门，从那些传教士以及外国留学生的口中，我开始认识了世界，同时也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萌发了一种遨游天下的幻想。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幻想也越加强烈。然而，最吸引我的莫过于漫游那遥远的东方。虽然远隔重洋，但对我来讲，那是一个神奇

的世界，好奇心驱使我一定要去目睹一下那东方的明珠——中国。

自从马可·波罗将中国的信息带到世界，中国便成了各国瞩目的地方。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当时西方人，特别是一些列强把中国视为一块肥肉，他们对中国的向往只限于掠夺。

我当时对中国的了解，也免不了带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但也不像听《天方夜谭》那样近乎神话。因为，它毕竟是世界上的一块国土。我对中国的神往是针对那块土地上善良的人及所发生的事件。从父辈们的口中，我了解到许多我从未听到过的事情：从中国的小皇帝登基，到大清朝廷的覆灭；从辛亥革命的爆发，到北伐革命的失败，等等。然而其中最引起我重视的要算是中国的妇女问题了。我大学毕业后，即到了美国全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这是一个以妇女及学生为工作对象的组织。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尤其注意世界各地所存在的妇女问题。妇女是整个人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在世界的不同国家里，她们却遭受着各种不公正的，有些甚至于残忍的待遇。19世纪的西方妇女在婚后便失去了独立性，不可走出家门工作，否则即被视为大逆不道；亚洲有些地区的妇女出门必须披戴面纱，不得露面，否则即被视为轻浮；寡妇不能再嫁，否则，被认为不守贞节。而那时的中国又是怎样的呢？中国的妇女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当然那些富家闺秀除外，广大的中国劳动妇女没有文化，没有自由，不仅遭受三座大山的压迫，而且还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她们那双小脚就是她们苦难的缩影。在婚姻方面，妇女更没有自由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竟成了妇女们的一个信条。而婚后的生活呢？又都是苦如黄连。这些事实，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讲，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中国有句俗话：“百闻不如一见”，所以，我想到中国来，就是为了看看这里的妇女，更主要的是想为这里的妇女争得一息自由。

我所看到的 20 年代的中国

说来也算是“缘分”吧，有这么一天，我真真要去中国了。这是 1926 年，受中国全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的邀请，美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委派我到中国去工作。我兴高采烈地踏上了旅途，横渡太平洋，绕道日本，到达了中国的上海。面对眼前这奇异的世界，我几乎要喊出声来。上海，完全不同于我来的那个世界——我的家乡。在这里，我确实是一个陌生的人。我睁大了眼睛，摄取我从未看到过的一切景象。啊，我终于看到那三寸金莲了！我不禁感到心酸。的确，这没有什么可欣赏的，因为她们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被扭曲了的美；同时，从她们那摇摆的身躯里，我又似乎感到了一股要挣脱束缚的力量。我觉得我应该帮助她们，并且有责任向全世界控诉中国妇女所遭受的非人待遇。

来到中国以后，由于语言不通，我得先到北京华语学校去学习中文。因此，我便踏上了去北京的旅程。高兴的是，这又为我能够更多地了解中国提供了一次很好的机会。

20 年代的旧中国，是一个兵荒马乱的世界。在我去北京的路上，军阀混战留下的遗迹不堪入目。火车站、渡口，到处挤满了破衣烂衫的难民。街头上战争孤儿们流离失所，有些孩子为了活命，在身上插根草表示自卖。看着这些情景，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马可·波罗介绍过的“黄金圣地”。

到北京后，出现在我眼前的又是另一番景象。这里虽没有上海洋气，但也不失城市所具有的特色。现在经常听朋友们说，北京的秋天最美。可我那时到北京，也正值金秋时节，而金辉底下照耀的却是悲惨的世界：那是没有高楼大厦做衬托的城市，没有汽车急驰的大道；有的只是黄包车夫用汗水洗刷的街巷，用四合院拼搭起来的住宅，以及为生活而日夜奔波的人们。北京不仅如此落后，它还受着外来的践踏。我记得一天到街上散步，一辆黄

包车从我身边擦过后停了下来。我看到上面坐着个外国海员，他正准备下车，那个黄包车夫便过来向他要车钱，可海员嘴里咕噜了几句便要走。车夫紧追不放，海员突然转过身，打了车夫两记耳光，扬长而去。我当时真是气愤极了！真是岂有此理，坐车不给钱，还打人！我为这个车夫打抱不平。可是又有谁来过问呢？难道中国人就甘心如此受欺压吗？不，正像人们所说的，地底下蕴藏的是岩浆，而岩浆总有一天会爆发。慢慢地，我开始认识了真正的有骨气的中国人。

我在北京华语学校学习结束后，被派到山东基督教女青年会帮助工作。在济南齐鲁大学，通过一位教授朋友介绍，我结识了一些进步人士及学生，受到了很大的启发。那时，在学校里，学生们举办了“夏日讨论会”，一两个星期一次。受朋友之邀，我也怀着极大的兴趣参加了。在讨论会上，同学们畅谈自己的思想，阐述对社会的认识，抨击黑暗的旧势力。在这儿，我接触到了革命思想，同时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势不可挡的中国革命力量的潜在发展。在当时，我谈不上具有革命的理想，但我也是有改变不合理社会的欲望的。这种欲望是我在读大学时就滋长了的。在大学，我学的是社会科学，经常去作些社会调查。一次，我来到了一户人家。一进门，就惊呆了，房里什么家具也没有，床上躺着位老人，床边站着个孩子，已是寒冬季节了，可房子里一点烧火用具都没有。孩子身上穿着一件薄薄的外衣，赤着脚，冷得直打哆嗦。据孩子说，爸爸失业了，为了糊口，他们卖掉了家里所有的家具。冬天来了，煤的价格直线上升。他们连饭都吃不饱，更无奢望想别的了。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既同情又愤怒。这个世界大不平等了！我们应该改变它，建设一个无人受苦的世界。而现在在中国，我看到了具有这种理想的人。他们所反对的正是我所痛恨的，他们所追求的也正是我所向往的。通过他们，我似乎预见了自己所要走的路。他们给我的影响真是太大了。现在想来，也许那正是我认识革命，并向中国革命靠近的第一步。

我与中国福利会

提起中国福利会，人人皆知，但如果说起“保卫中国同盟”，也许知道的人就不多了。翻开中国福利会的历史，就会清楚地看到现在的中国福利会是在“保盟”和“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三个不同阶段记载了中国福利会坎坷不平的历史，以及中国福利会对中国革命作出的不朽贡献。不过今天在此，我将着重谈谈“保盟”的工作，因为我曾有幸亲身经历这段历史。

大家知道，宋庆龄是“保盟”的缔造者，可你们知道她为什么要成立“保盟”吗？

30年代的中国，仍处在一派黑暗笼罩之中。那时的上海租界遍布，各大场所均由外国人把持着。外滩公园的门口贴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标牌，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一种侮辱。尤为骇人听闻的是中国辽阔的国土居然遭受日本军国主义铁蹄的践踏。日本人想把中国攫为己有。然而，人不能以富而治人，国不能以弱而自馁。中国人民觉醒反抗的一天终于来到了。1937年“七七”卢沟桥的炮声震响了中国大地，从此揭开了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抗击日寇的序幕，显示出中国人民不甘受奴役的志气和奋力抗争的决心。我为中国人民的举动而感到振奋！的确，中国人民的崛起，不仅向日寇、而且向全世界表露了她不屈的意志。

然而，任何事情都不会一帆风顺。当时，虽然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广大劳动大众开始了抗战。可是，国民党内一部分人采取的却是消极或根本不抵抗的政策。大好的半壁河山被国民党葬送在日寇的手里，战火硝烟弥漫了前方阵地，而成千上万的难民、伤员似潮水一样蜂拥而至后方基地。上海成了孤岛，战祸惨重。谁来挽救这个局势呢？当时，身居香港的宋庆龄从各方面得知这些消息后，十分焦急，一定要赶出倭寇，解救中华。宋庆龄毅然

地站在主张抗日的中国共产党一边。为了积极地支援前方将士奋勇作战，为了更好地解救那些由于战争而无家可归的难民，在一些英国和美国朋友的帮助下，她联系了一批中国爱国人士在香港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宋庆龄打出的这面旗帜，振奋了许多爱国人士的心，而且她以这面旗帜有力地回击了蒋介石不抵抗的行径。

当时，“保盟”主要从事两方面的工作：一是为难民呼吁，并且募集资金、医药、食品、衣服等救济品支援抗日前线，支援八路军和新四军；二是出版“保盟”通讯，广泛宣传“保盟”的工作，向全世界呼吁中国人民的需求。

一开始，“保盟”就取得许多成就。国外友人纷纷给予帮助，“保盟”为抗日根据地输送了许多物品。另一方面，“保盟”通讯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把中国的消息带给了世界，引起了世界上爱好和平人民的广泛注目；“保盟”通讯以它犀利的笔锋，直刺反动派的心脏。“保盟”通讯是最早揭露蒋介石不抗日，而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的罪恶行径的刊物。“保盟”通讯好像一扇窗口，使外界人士更加看清了中国的内幕。

开始我并没有直接地帮助“保盟”工作，只是作为一个同情中国革命及抗日战争的人士，在我本职的工作岗位上，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为我所认识的爱国人士的地下活动打掩护。我记得，有一次一位地下工作者找到我，告诉我他们组织里的两位同志的活动被敌人察觉了，那两位同志必须转移，而那时他们又不使出面找房子，所以，他们想得到我的帮助。对此，我欣然答应了。我为他们找到了合适而又安全的住所，并为他们购置了所需要的一切，还帮助他们做了些联络工作。对于革命工作，我是有求必应。另一面，我还为女青年会举办的夜校上课，为女工们讲解社会的各种不同的矛盾，让她们认识到自己应该为争取自己的解放而斗争，自己的命运应该由自己来掌握。

然而，环境决定了人的意志。我终于意识到了自己决不能再

作旁观者了。我要给予中国人民一个美国进步人士的真正的支援。

但是，那个时候，美国政府却是站在蒋介石国民党一边的。对于日寇的侵略，他们开始采取的是消极抵抗的政策。事实上，所谓消极，有时干脆就是不抵抗。我记得给我感触最深的是上海“大世界”被轰炸。那是在1937年，一天，国民党的飞机去炸停在黄浦江里的日本旗舰，但正当飞机对准目标投下炸弹时，日本的高射炮抢先击中了飞机，国民党的飞机只得调头回飞，但已发射出的炸弹是无法收回的，这样，一颗落在汇中饭店门口，另一颗就落在了“大世界”。我那天有约，正准备到汇中饭店去，可出于小小的差误，再加上轰炸，就没按时去成，否则，按照时间地点，我说不定也成了遇难者了。事后，我采到了现场，那里被炸得一塌糊涂，在十字路口的中央有一个很大的炸弹坑，坑边尸骨遍地，看着惊慌失措的难民，我再也无法克制自己了。我相信，不仅我，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在看到这一幅惨景后，都不会无动于衷的。所以，我要加入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行列，支持真正抗日的美勇将士，以此来表示我维护世界和平的意志。

以后，随着“保盟”的发展，它需要在国内取得广泛的联系。这样，在“保盟”成立不久，宋庆龄委派了一个代表来到上海，联系上海的爱国进步人士，商讨“保盟”国内工作的开展事宜。完全出于偶然，通过朋友的介绍，我有幸参加这个聚会。而在这次聚会里，我是唯一的外国人和妇女。为此，我感到很自豪。在会上，香港代表传达了宋庆龄的指示，并且说了他此行的目的。我们大家也针对局势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都表示愿意和“保盟”合作。在结束时，香港代表提出成立“保盟”分会，并征求大家的意见。当然到会的朋友们都异口同声地表示赞同。就这样，“保盟”上海分会成立了。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志愿，把工作在不同岗位的人们联系在一起，在那白色笼罩的上海，又多了一个不寻常的地下组织。

“保盟”分会的成立，意味着“保盟”组织的发展壮大。然而，在当时的上海，工作每前进一步，对我们来讲都是很艰难的。国民党和日本的特务、密探遍布大街小巷。他们都具有狗一样灵敏的嗅觉。而我们这个秘密组织，又有着大量的工作要做，怎样才能暗中取胜呢？这就需要我们每个人智勇双全。在我们第二次聚会上，由于朋友们的信任，我被推选担任“保盟”上海分会的秘书工作。我个人也乐意担任，这是因为在当时上海那样艰苦的环境里，我，一个外国人，在某些方面，做起工作来到底要比一个中国人容易而又安全得多。我记得当时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向在香港的宋庆龄传递信件、报告情况。现在的同志们听起来也许很好笑，原来就这么容易的一点事啊，把信扔到邮筒里不就行了？其实不然，在那种年代里，所有通过邮局寄出的信件，都得经过检查，更不用说是寄给宋庆龄的信了。所以，为了避免麻烦，我们只能另想办法。那时在上海每周都有一艘美国“总统号”客轮，接送来往于美国——中国的旅客。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时机，再加上我是个外国人，好做掩护。这样，我便成了“总统号”上的常客。“总统号”是艘很大的客轮，而那时的黄浦江码头还很狭窄，容不下轮船靠岸，所以，每次它都停在江中心，要上船的人必须坐渡船登轮。轮船停靠的时刻表在报纸上有登载。这样，每次我从客船时刻表上了解到“总统号”停靠的时间后，便等在黄浦江码头上。有时，要等上几个小时，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在码头海关检查站口站着检查人员，密切注意着旅客及送客的举动，稍有疏忽，后果不堪设想。每次送信时，我总是穿件茄克衫，将信藏在衣内的口袋里，从容地在岸边徘徊等候。等轮船来了以后，我跳上渡船，到了“总统号”后，我便爬上舷梯。为了不使人家看出我是怀有特殊使命面上船的，我便装得悠然自得的样子，观赏着轮船的各个部位，慢步来到邮筒边，然后，乘无人之机，将信投入邮筒，随后返航。我自己真不敢想象我居然有这么大的胆量。事后，我自豪地把我的行为称之为

“信件走私”。的确，谁也不会想到，在这样一个繁华的城市里，我们给宋庆龄的信件竟是通过这种途径寄出的。现在想来，还真带有点传奇色彩！

“保盟”上海分会的同志们并不都是专职在“保盟”工作的，他们有自己的职业。例如我当时的公开身份就是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学生部的顾问。这也给我的工作带来了方便，我可以利用自己的身份开展活动。那时，“保盟”上海分会主要是接受香港的指示，除了接应国外寄来的募捐品，负责把它转送给新四军、八路军外，还在适当的情况下，在本市做些募捐工作，如举办义演义卖是常有的事。我记得我们联合上海的一些大团体，就曾举行过名为“文化之夜”的大型募捐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我们不仅募到了许多捐款捐物，还结识了各阶层的进步人士，加强了联络。之后，我们主办单位再将所得之捐物分到各个救济区。而我们“保盟”分会也将国外寄来的医疗器械等连同本市的捐物一起运往抗日根据地。那时，大部分的东西是运往西北，那里是中国革命风起云涌的地方。随着革命的发展，我们的支援面也扩大了。我记得一天早晨，我刚开始工作，就听到了很轻的敲门声，我警惕地打开门，走进来的是一个男同志。我一愣，因为我们那时基本上是单线联系的，而眼前的人，我却不认识。接着，那个人作了自我介绍，说是宋庆龄派他到上海来找我的，我消除了疑虑。原来这位同志是从皖南前线来的。他告诉我新四军急需支援。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为了支援新四军，我们想尽办法，从国内外搞到大量的医疗器械和药品，送往安徽地区。

募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运送就更加困难了。这么多的救济品要通过邮局出去，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把物品做好伪装，派人一个点一个点地接应。在市区，我们用得最多的办法是联系邮局的内线，在他们下班后，到指定的接头地点，把东西混在已经检查过的包裹中间，“走私”运出。“保盟”的有些年轻人，为了工作，还机智地打通了国民党关卡的检查人员，为我们放行。在

此，我要毫不隐瞒地说，有些激进的国民党官兵确实是帮了我们很大的忙的。不光如此，在转送方面，我们还得到了一些到内地去的外国朋友的帮助。我的一位在教会医院工作的朋友，就曾热心地帮助过我们。那时，他正准备到浙江去，听说我们有困难时，他主动向我提出：“我可以帮助你们。”为了方便，我们把东西放在他的箱子里，当成行李，神不知鬼不觉地带了出去。

“保盟”为抗战提供了大量的物品，小到药品、食物，大到救护车、医疗器械，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而我们那时做的工作还远不只这些。我们还利用方便，做了许多的联络工作，与国外友人联络，与革命根据地联络。许多国外友人及国内的进步青年，或是通过香港总会，或是通过我们，到了根据地。大家一定还记得加拿大友人、国际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他当年到中国来，首先就是与“保盟”香港总会取得联系的。“保盟”为他作了介绍，替他 with 革命组织取得联系，他才能平安地到达了目的地。白求恩带的医疗器械从国外进来后，也是通过“保盟”转运到内地的。

“保盟”上海分会的同志们，虽没经过炮火硝烟的洗礼，但却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我们做的都是些现在听来极为平凡的工作，但在那种年代里，有时却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我们随时都有被逮捕暗杀的可能。然而，即便这样，“保盟”的同志们还是一腔热血地奋斗着。我永远忘不了那些被反动派杀害的同志们。我记得我们有位很好的同志，他叫张似旭，是搞宣传工作的。不幸的是他上了反动派的黑名单，反动派竭力想抓住他。我们得知后，立即通知他躲起来。他躲了，等事态稍为稳定后，他又继续单独活动了。但是，反动派是狡猾的。一天，当他到一家饭馆吃饭的时候，特务认出了他，结果他被暗杀了。这件事使我们震惊。我们失去了一位勇敢的同志。然而，我们并没有被反动派的威胁所吓倒。相反，这更证明了我们“保盟”的作用。敌人的害怕，更增添了我们的勇气，我们坚定地踏着战友的血迹继续前进。

我与宋庆龄

宋庆龄的名字是不朽的。她与中国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的名字连在一起，更加显得光彩夺目。她是白玉无瑕的女性，她是英勇无畏的战士，她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她的理想，她的祖国。也许大家听到过人们对宋家三姐妹这样的评价：姐姐蔼龄爱钱，妹妹美龄爱权，而宋庆龄爱国。她确实有一位无私的爱国主义者，所有认识她的人无不对她的言行所感动。她称得上是中国大地上的一位杰出的女性。

宋庆龄的杰出表现在多方面，然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在政治上的坚定，信念上的专一，对友人的真诚。也正是这些，使我每想起她，都不禁对她肃然起敬。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仍处于黑暗之中。孙中山先生被迫流亡海外。这时的宋庆龄正好结束了她的学生生活。她，一腔热血，满怀着革命理想，毅然追随孙中山先生，开始了她漫长的革命生涯。在与孙中山先生一起的年月里，她以她的热情，给了孙先生巨大的支持和无限的慰藉。孙先生过世后，宋庆龄所显露出来的无限的智慧和才干，人们将无可非议地说：宋庆龄确实是万众瞩目的女中豪杰。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宋庆龄以她坚定的政治信念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她不畏强暴，忠贞不渝地维护孙先生的三民主义，为实现孙先生的遗愿而奋斗。她遵循孙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毫不犹豫地、坚决地与背叛孙中山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决裂，最终与真正解救中国人民大众的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她不仅给中国共产党人以极大的援助，而且，还唤起了一批爱国民众。“保盟”就是一个例子。为此，国民党特务曾多次给她写恐吓信，还曾给她寄过子弹头，以此来威胁她。但是，她没有倒，相反，她更加

坚定不移地投入了战斗。

对于宋应龄的一切，开始我都是从报纸上看到，或从朋友那儿听来的。但即使是言传，同样也引起了极大的兴趣。我渐渐地认识了她，我对他充满了敬意。后来，我自愿帮助她工作，也是因为我们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的心。我在“保盟”上海分会工作时一直没有机会见到她。我心里认为，这样一位坚强的女性，定是位可敬而不可亲的人。然而，事实否定了我的想象。我第一次见到宋庆龄，是在我回美国之际。我在回美国之前，我想利用这个时机去巡视一下中国内地。按照正常的路线，我应该首先得到日本领事馆的签证，这样才能坐船到南京，再到武汉。但是那时，我不愿意在我的护照上盖有日本人的签证，所以，我情愿绕道乘船到香港，在香港办理去北越的签证，再从海防到河内，然后入中国国境，到中国内地去。我在香港逗留时，兴致勃勃地拜访了宋庆龄。时值1940年初秋季节。这一天，我来到宋庆龄的住所，不像我想象的那样豪华，但却很幽静、典雅、朴素，衬托出女主人的性格。宋庆龄出门迎接了我，她亲自把我领进了房间。由于已有的工作联系，我们一见如故，谈了许多许多。从言谈中，我们有了更多的了解，彼此增进了友情。现在想来，我那次绕道虽然远了点，但确实是很值得的。

以后，“保盟”总会迁到了重庆。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它才迁回上海，那时，我也从美国回到上海。我在女青年会的办公室，离宋庆龄的办公室只相隔两条马路，我们又有了更多的交往。我经常收到“保盟”的请帖，共进午餐。我当时很乐意赴宴，因为说是吃饭，其实是执委会议，由宋庆龄主持，大家共同研讨“保盟”工作。

宋庆龄是一位极重友情的人，她对她的国家、人民，甚至对全世界都赋予了崇高的爱。无论谁有困难，她都竭力相助，使人们无不倾心于她。我最难忘怀的就是当我受到危难的时候，宋庆龄对我伸出的友谊之手。

50年代初的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在这场劫难中，我也成了受难者之一。我因大谈中国革命，被视为共产主义的同盟者，是赤色分子，而被美国女青年会解雇。对此，我愤愤不平。几十年来，我努力工作，而现在我却失业了。一天，我突然收到了一封电报，上面写着：“立即回中国工作——宋庆龄”。没有经过我那样遭遇的人是想象不出我当时激动的心情的。这种来自异国他乡，来自地球那一边的友情抚慰了我的心。我决定舍弃这不合理的国度，投向光明照耀的新中国。可是我怎么去呢？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那时的美国是不给开护照的，再说像我这样的人，阻力就更大了。然而，又是宋庆龄帮我安排了旅程。我从美国绕道西欧，从西欧进入香港。宋庆龄派人在那里接应我。这样，我又回到了上海。在上海宋庆龄派一位朋友拿了一份表格来让我填。这时，我感到为难，因为名字和年龄都好填，可是职务呢？那位朋友看出了我的心思，他接过笔，在职务一栏里郑重地填上了“顾问”两字。我顿时热泪盈眶，心里激动不止：“感谢你们，感谢宋庆龄，我将很好地履行我的义务。”像得高兴的是，从那时起至今，我就一直住在中国，一直担任着“中国福利会顾问”这个美好的职务。

回忆中国农学会

吴觉农

中国农学会的前身，是中华农学会，它是1917年在上海建立，一直坚持下来的学术性群众团体。如果要追根求源，那么我国最早出现的农业学术团体，还可以上溯到1895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创办的“农学会”，1897年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办的“农务会”。1915年留日学生胡昌炽等在东京成立过“中华产殖学会”。留美学生过探先、邹秉文当时也在美国康乃尔提出过同样的倡议，后来就和理工科的赵元任、杨杏佛等，联合起来创立了有名的“中国科学社”。留法学生谭熙鸿、葛敬中、蔡无忌、莫定森等，也在巴黎创办过“新中国农学会”。抗日战争时期，乐天宇、陈凌风、方粹农等在延安发起成立了中国农学会。解放初期，自然科学界的群众团体，包括中华农学会及其有关的农科各学会，和延安中国农学会的成员，组成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并设立了中国农学会筹备委员会。1956年在中共中央提出“向科学大进军”的号召下，以中华农学会为基础，正式成立了中国农学会。同时召开了中国农学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它的组织体系和学术活动。与中华农学会一脉相传，因此它的历史也应该连贯起来，从1917年算起。

1916年，是中华农学会酝酿筹备的一年。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欧洲打得炮火连天；国内则是袁世凯帝制失败，段祺瑞上台执政，北洋军阀各霸一方，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尤其是